包刚升：从民主失败的经验中学习（上）

包刚升
2015-01-08 10:02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包刚升博士所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自2014年6月出版以来，好评如潮。2015年1月6日，该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新京报》在致敬辞中说：“这是一次观念的探险，包刚升带着浓郁的问题意识，深入到民主政治的内部，辨识其运行的内在机理。在成功的民主和崩溃的民主之间，他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其不同的经验教训。于亨廷顿、戴蒙德和林茨等大师的研究之外另辟蹊径，收获了一片别开生面的学术风景。”

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的书名容易引来争议，甚至被标题党读者误为否定民主之作。而民主已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如作者所言，该书的目标是探讨部分国家民主崩溃的原因，并为避免新兴民主政体失败提供政策建议。那么，《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这部“年度社科书”到底讲了什么？包刚升博士曾应邀于2014年12月在中国政法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讲座，演讲历时两小时，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庞金友教授。澎湃思想市场将其讲座录音整理编撰，并请作者修改润色，遂成此文，以飨读者。此为上篇。

一项好的研究要有正确的方法。很多人对政治学的兴趣是从研读政治哲学经典开始的。政治哲学很重要，好的政治科学研究通常都以好的政治哲学训练为基础。但是，今天讲座要介绍的是政治科学的方法，或者说是经验研究的方法。我不仅会讲自己研究了什么以及有何发现，而且还想顺便介绍“如何做一项经验研究？”的基本思路。

今天的讲座有几个特点。一是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尽管议题很宏大，但问题很具体。二是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过去国内学界做得比较多的是对国际前沿研究的译介与综述，但我试图提供一项解释民主崩溃的新理论。三是注重实证研究规范与因果机制。当陈述一个观点时，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说？还是我只是想表达一种意见而已？我能够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严密的逻辑与证据吗？四是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尽管比较历史分析在国际学界不算什么时髦的新东西，但国内政治学界用这种方法做一项大型经验研究的还不算多。当然，在国际上，《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和《国家与社会革命》名著等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经典。

为什么人民选择了希特勒？

经验研究通常从一个明确而具体的问题开始。你的问题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我的问题是：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崩溃？

现在有不少人是标题党，一看标题，就把你的观点和立场定性了。有人看到这本《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书名，就想当然地认为作者要否定民主。但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感兴趣的是，19世纪以来的民主化浪潮中，有些国家的民主政体不是很稳定，甚至出现了崩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打个比方，就像开车一样，如果出现了恶性交通事故，那么原因是什么呢？而不是说开车就必然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相反，研究交通事故是为了防范交通事故的发生。

民主崩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德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而且很早就拥有一部很民主的宪法，即1919年《魏玛宪法》。在魏玛共和国之前，德国已实现了一定时期的竞争性政体。从1871年到1918年，尽管德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但是很多国民都有政治参与的机会，政治领域和国会内部也存在政党竞争。一战失败后，德国转向了更充分的民主政体。但是，魏玛共和国很快就出现了严重问题。

特别是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危机越来越严重，希特勒领导

热新闻
一天 三天 一周
1 最高检通报任润厚案：涉腐被查后死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没收
2 豆瓣、唱吧、爱回收等106款App被工信部下架
3 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4 沈阳一楼盘降价已被要求回收房源，官方：房开违反《价格法》
5 美国会审议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外交部回应
6 顾客买41万手镯遭店员议论气到“眼震”要住院？卡地亚：在处...
7 央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现行7%提高至9%
8 涉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等，上海文峰公司被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
9 四问首个国产新冠特效药
10 易纲：恒大债权人、股东权益将按法定受偿顺序得到尊重
澎湃招聘
澎湃新闻APP下载
iPhone版 iPad版 Android版
联系我们

的纳粹党崛起了。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纳粹党已经取得30%以上的选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总统才不得不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他上台后，先是通过一系列手腕控制了政治权力，最后把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颠覆了。所以，从实际政治过程看，希特勒与纳粹党的上台首先是普通大众选择的结果。一个极富政治意味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民选择了希特勒？这是一个大问题。

民主崩溃并非罕见现象

如果深入研究近现代世界政治史，就会发现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崩溃并非特例。大家过去应该听过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但是很少听过民主崩溃，过去大陆学界也很少有人用民主崩溃这个概念。然而，民主崩溃是影响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民主崩溃的历史几乎同民主的历史一样久远。当然，我们通常更关心近现代政治史的变迁。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讲“三波民主化浪潮”时,同时还提到“两波民主化回潮”。但后来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关注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两波民主化回潮则关注甚少。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在《民主的精神》一书中统计了1974-2006年的民主失败，数量为20次（个别国家计数存有争议）。我本人的一项研究揭示，一个国家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平均要经历1.5-1.7次民主崩溃。所以，民主崩溃并非罕见的政治现象。

那么，怎样界定民主崩溃呢？简单地说，民主崩溃指一国民主政体向非民主政体或无政府状态的逆转。国际上有一个著名的民主评级机构叫Polity Ⅳ，它每年都会给世界各国政体进行民主评分，从最低的-10分到最高的10分。基于该机构的数据，我们可以确定一个衡量民主崩溃的量化标准，比如在连续3年内民主评分下降6分以上。这种衡量会比较精确。

但是，我这项研究是定性研究，所以没有刻意追求这样一个量化指标。通常，民主在研究操作上被视为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从程序上讲，民主的主要含义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借用这一概念，民主崩溃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在政治参与或政治竞争任一维度上的显著的和重大的下降。这是一种定性的标准。

从类型上看，民主崩溃有三种典型情形：第一种是从民主到军事政变，第二种是从民主到内战，第三种是从民主到行政政变。前两种情形易于理解，但行政政变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前面提到的希特勒的做法就属于行政政变的典型。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掌握政治权力后，逐渐在各方面推进威权化和极权统治，这就是行政政变的典型例子。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项研究把外部威权国家入侵导致的民主崩溃排除在外，这就不是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因素能解释的了。

问题提出以后，接下来要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总的来说，关于民主崩溃的系统理论研究很少见。耶鲁大学教授胡安·林茨1978年主编过四卷本的《民主政体的崩溃》（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林茨本人撰写了理论篇章，但他的论述介于经验描述与因果解释之间，并非是关于民主崩溃的系统理论解释。现在国际上比较常见的是关于民主失败的案例研究。德国、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国家，巴西、智利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尼日利亚、刚果这样的非洲国家，以及巴基斯坦、泰国这样的亚洲国家，都经历过民主崩溃。所以，民主失败的案例研究并不少。但是，这类研究并不试图提出一个解释民主崩溃的一般理论。

从解释变量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结构因素，包括阶级冲突与高度不平等、经济落后和低经济绩效、社会分裂因素、政治制度缺陷等对民主稳定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是能动因素，主要是政治精英的信念、战略与行为选择对民主稳定性的不利影响。这些解释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我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论。

用一项简洁理论来解释民主崩溃

我对民主崩溃的理论解释非常简洁。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国内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很高，二是政治制度安排是离心型的，那么该国民主政体就倾向于崩溃。

这一理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用数百字的篇幅简要阐述了其中的道理：

“民主政体崩溃通常都起源于国内政治的某种紧张关系，这种政治紧张关系愈演愈烈，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当这种政治危机无法在现有的民主政体框架内解决时，很可能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因此，解释民主政体下政治危机的起源和激化，是解释民主崩溃的关键问题。

“政治危机的形成和激化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国内存在某种较为严重的政治冲突，表现为两个或数个政治集团间激烈的对抗。而这种政治冲突是国内社会不同选民集团存在严重的政治分裂的反映。第二个条件是民主政体下国家或政府没有能力去缓和、平息或解决这种严重的政治冲突。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与严重的政治冲突相比是较弱的。固然，一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都会影响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的高低，但在这些因素既定的条件下，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能力的高低具有决定性影响。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有助于塑造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会削弱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

“因此，这项研究对民主崩溃的理论解释可以总结为：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缓解或解决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国内政治危机就会持续恶化，最终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从选民分裂到政治冲突

到此为止，我的主要理论已经讲清楚了，但没有细节。接下来，要介绍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第一个解释变量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过去就有学者认为，不同选民群体之间高度的政治分裂容易引发冲突。胡安·林茨认为，西班牙在1936年内战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西班牙1936年）政治危机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分裂和冲突。阶级冲突、宗教冲突和地区冲突互相联系又互相作用，这些冲突的强度都非常大。”一个案例提供不了系统的验证，但这至少说明，林茨认为社会分裂很严重的话就容易导致政治冲突。

我的研究则从一般意义上强调社会分裂结构对选民投票行为、政治精英策略、政党体制以及政治冲突的影响。当然，我更喜欢用选民政治分裂的概念，而不是一般化的社会分裂概念，理由是前者更准确。实际上关于社会分裂、政治分裂与政治冲突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不少学者都认可，政治冲突通常都源自政治分裂，政治分裂导致政治冲突，而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容易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我的书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那么，选民政治分裂有哪些主要类型？20世纪以来，有几种主要的政治分裂：（1）阶级分裂，主要与贫富差距有关，贫富悬殊的社会更容易出现严重的阶级分裂。（2）宗教分裂，主要发生在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比如埃及、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关于建立世俗国家还是宗教国家分歧非常大；还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者之间，比如不少国家存在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立；还存在于同一宗教内不同教派之间，比如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可能对立严重。（3）族群分裂同样非常重要，主要存在于一个社会的不同族群集团之间，比如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卢旺达。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族群，而且这些族群有着复杂的历史恩怨，民主政体在这样的社会真的能搞成吗？这是个问题。（4）还有地区分裂，这种分裂经常跟族群、宗教、语言等维度的政治分裂叠加在一起，但地区分裂可能引发领土问题。（5）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政治分裂，一些国家引发激烈冲突的是选民在民主和威权这一政体维度上的严重分歧，就是说有人赞成民主，有人赞成威权。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内部存在上述一种或多种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就会对该国的民主政体产生较大压力。

选民政治分裂看得见吗？

那么，如何衡量选民政治分裂呢？衡量选民政治分裂的高低——如果技术上可行的话——最完美的方法是做选民调查。但是，历史上的选民调查数据具有不可复制性。所以，我设想了一种并不完美、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来衡量选民政治分裂程度的高低，主要是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选民的投票结构。大家知道，过去很长时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选民投票结构集中在中间，这意味着选民分裂程度并不高。但是，有些国家的选民投票结构向左右两端移动，由单峰分布向双峰分布移动。显然，这种情形下的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就要高得多。从操作上讲，投票结构是过去发生的且易于衡量的，过去所有重大选举的此类历史数据几乎都能找到。

第二个是政治议题的类型。我根据一个政治议题（1）对选民利益的重要程度和（2）选民在这一议题上的分歧程度，区分出三种类型：共识型议题、妥协型议题与冲突型议题。共识型议题是指利益关系不大、选民分歧也不大的议题，冲突性议题是指利益关系重大、选民分歧也很大的议题，妥协型议题则处在中间。如果一个民主社会充斥着大量的冲突性议题，可以认为选民的分裂程度很高。借助媒体的报道、政党的党纲以及候选人的竞选主张，等等，都可以判断出这个社会的政治议题是偏向于冲突型的，还是偏向于共识型的。

第三个是政治暴力或准暴力的程度。在民主政体下，政治暴力经常是政治诉求无法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得到表达的结果。所以，政治暴力盛行也是选民政治分裂程度高的反映。这里的政治暴力包括街头骚乱、政治暗杀、武装冲突、暴动、军事政变企图等。此外，政治大罢工等往往具有准暴力的性质。比如，智利20世纪70年代初所爆发的全国卡车业主大罢工，就具有这种性质。卡车业主不仅通过罢工致使全国交通运输瘫痪，而且直接把罢工的卡车停在通往首都的交通要道上，导致首都食品供给受阻而产生恐慌。这样，其效应跟政治暴力很接近。

我的预设是，在呈现高度选民政治分裂的国家中，选民的投票结构倾向于两端，重要的政治议题趋于冲突性，政治暴力与准暴力事件趋于上升。通过这三个主要指标，应该可以有效判断选民政治分裂程度的高低。

两种民主模式：离心型与向心型

第二个解释变量是离心型政治制度。政治学最早的研究就关注政治制度。我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政体研究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实际上，一个民主政体不仅要看它是否符合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标准，同样要看它是否具有恰当的政府效能。可以说，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民主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民主崩溃整个链条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胡安·林茨认为：“当民主政府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而民主的反对派自认为非民主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时，这一过程持续的结果就是民主政体的崩溃。”比如，民主政体下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冲突，但民主政府又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冲突，就可能有人跑出来说，你们把政治权力交给我，我来搞定这些事情。实际上，阿道夫·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就是这么干的。

现在有不少研究论证，一国政治冲突程度高和政治暴力泛滥，跟该国的国家能力不足有关。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学者主张，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应该把国家和国家能力的因素考虑进来，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蒂利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如果缺少足够的国家能力，一个国家就不能实现有效治理，从而使民主丧失保存其自身的手段。但是，过去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民主是民主，国家能力是国家能力。像著名学者王绍光教授认为，有效政府或国家能力在前，先要建设好有效政府，才能建设民主。最近，弗兰西斯·福山也提到类似观点，他把有效国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视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准菜单，有效国家具有优先性。

与他们不一样的是，我认为民主政体本身的制度构建会影响国家能力的高低。而不是等国家能力建设好了，再来建设民主政体。所以，这是一个新观点。实际上，对于民主共和政体下政府效能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文集》不仅重视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权制衡，而且还很重视政府效能，重视“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的必要性。至于后来的国家理论学派，更是强调有效国家的重要性。

那么，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影响国家能力呢？基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我关注的是三种主要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能力的影响。第一个制度影响到所谓的“国家性”（statehood）问题——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问题。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首先需要解决国家是否存在的问题。当国家不存在时，就谈不上所谓的国家能力或有效政府了。与“国家性”相关的是央地关系上的政治制度模式。

第二个制度是选举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影响的是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说，选举制度是把政府外面的社会力量输入政府体系的方式。所以，这种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到在此过程中政府能不能得到有效塑造。合理的选举制度与有效的政党制度，通常有助于强化国家和政府体系的力量。

第三个制度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国家能力或政府效能。根据两者关系的不同，政府形式可以区分为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这一领域已形成很多有研究价值的结果，关键问题是：议会制、总统制与半总统制的内在制度逻辑及其对民主稳定性的影响。

在对具体政治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把民主政体分为两种抽象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centrifugal democracies）与向心型民主政体（centripetal democracies）。这两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但是我赋予了它们以新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阿伦·利普哈特1969年就提到：“我们把一致化的、稳定的民主政体称为向心型民主，用来替代盎格鲁—美利坚式民主的说法，而把碎片化的、不稳定的民主政体称为离心型民主，用

来替代欧洲大陆式民主的说法。”

除了利普哈特，很多学者都提到过类似的讲法。比如，林茨在不同文献中都提到“极端的、极化的和离心型的多党制”、“带有离心趋势的极端多党制”等说法。著名政治学者乔万尼·萨托利认为极化多党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离心性驱动力对向心性驱动力可能的超越”。我大概总结一下，从林茨到萨托利等人，他们所理解的离心型民主政体大概是：（1）国会政党数量极多；（2）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的差异很大；（3）内阁或政府更迭频繁（议会制下），或者总统在国会仅能获得少数议席的支持（总统制下），总统和国会的政治对抗严重。此外，1990年《美国政治学评论》曾经刊发过一篇论文，认为选举制度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种向心激励主导，一种离心激励主导。这些学者提出的概念，都跟我的这项研究有关。

离心型民主政体的政治后果

那么，如何界定离心型民主政体与向心型民主政体呢？需要说明的是，利普哈特早年对向心型民主和离心型民主的划分更多地是基于结果，而我的类型划分是基于不同的制度特征。先不要管结果，而是先看制度安排本身。我这项研究用三个制度层次来区分上述两种民主模式。

第一个是“国家性”维度上的制度安排，关键是央地关系的政治制度模式。一边是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这种安排导致离心激励主导、地区认同为主、弱化中央权力；另一边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导致向心激励主导、国家认同为主、强化中央权力。前者是离心型特征，后者是向心型特征。

第二个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首要的是选举制度。一边是比例代表制及其类似的制度，离心激励主导，鼓励极化多党制，政府通常不稳定；另一边是简单多数决定制，向心激励主导，鼓励两党制或温和多党制，政府通常比较稳定。前者是离心型特征，后者是向心型特征。

第三个是政府内部的制度安排，主要是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一边是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容易导致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对抗。历史上非常稳定的总统制国家，主要就是美国，很多总统制政体都经历过民主不稳定。另一边是议会制，向心激励主导，鼓励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合作，这就强化了政府效能与国家能力。同样，前者是离心型特征，后者是向心型特征。

根据这三个层次的制度安排，我确定了离心型和向心型民主政体的理想类型。什么是理想类型？理想类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未必存在，但借助这一理想类型，可以把其中的逻辑与机制说得更清楚。如果一个国家在央地关系上是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政府形式是总统制或半总统制，这三种制度组合构成一个离心型民主政体的理想类型。如果碰巧这样的社会中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很高，政治冲突很剧烈，此种条件下的民主政体通常是不稳定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当然，这里的讨论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第一个问题是一国政治制度组合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一个制度层次上是离心型特征，但在另外一个制度层次上又是向心型特征。这又该如何判断该国政治制度的整体效应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再比如，政治制度还涉及到与社会结构的匹配性问题。我书中讲到，“国家性”维度上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国家内部存在严重的族群、宗教及地区分裂时，才会特别重要。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严重的族群、宗教或地区分裂，单一制和联邦制关系就不是很大，比如像日本或韩国。但是，对于有些国家——比如历史上的南斯拉夫或今天的尼日利亚——央地关系上的政治制度模式就非常重要。所以，上面关于离心型民主与向心型民主的衡量远非完美，但大家通过后面的案例可以看出上面阐述的理论逻辑与因果机制是有效的。

离心型民主政体会导致三种离心效应。第一种叫“国家性”问题上的离心效应，也就是地区或族群离心效应。这种离心效应通常会弱化国家认同，强化地区认同；弱化中央权力，强化地区权力。第二种叫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政党离心效应。这种离心效应通常会鼓励极化多党制，弱化大型政党的力量。第三种叫政府内部的行政离心效应，也就是行政机构无法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鼓励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对抗而非合作。这样，行政机关最后往往无所作为。

总结一下，我的主要观点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自变量一）和离心型民主政体（自变量二）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因变量）。这就是民主政体崩溃的政治逻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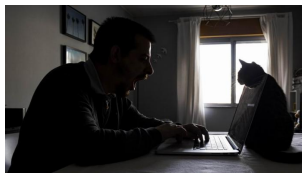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要举报

关键词 >> 民主理论,民主崩溃,包刚升

22　收藏　跟踪: 民主理论

相关推荐



“非工作时间禁止联系雇员”：葡萄牙劳动法带来的启示与问题

2021德国大选｜隧道尽头：新政府的出炉

法国共和党总统初选：即便“茶杯里的风暴”，也并非毫无意义

评论(34)

我要跟帖

已输入0字　发表

热评论

xnnx　2015-01-08　15 | 回复 | 举报

评论删好快

zzzZZZ　2015-01-08　4 | 回复 | 举报

年度社科书，赞

xnnx　2015-01-08　3 | 回复 | 举报

包老师治学很严谨

新评论

真善美_2049　2015-01-10　1 | 回复 | 举报

民主•核心价值观•经验～中国加油！

顺顺在飞　2015-01-08　1 | 回复 | 举报

国外是如何评价的呢？

愚观察　2015-01-08　1 | 回复 | 举报

成功的不学，学失败的？

Copyright © 2014~2021 The Paper All rights reserved.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 沪ICP证：沪B2-20170116 | 沪ICP备14003370号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0299号

包刚升：从民主失败的经验中学习（下）

包刚升
2015-01-08 10:02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包刚升博士所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自2014年6月出版以来，好评如潮。2015年1月6日，该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新京报》在致敬辞中说：“这是一次观念的探险，包刚升带着浓郁的问题意识，深入到民主政治的内部，辨识其运行的内在机理。在成功的民主和崩溃的民主之间，他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其不同的经验教训。于亨廷顿、戴蒙德和林茨等大师的研究之外另辟蹊径，收获了一片别开生面的学术风景。”

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的书名容易引来争议，甚至被标题党读者误为否定民主之作。而民主已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如作者所言，该书的目标是探讨部分国家民主崩溃的原因，并为避免新兴民主政体失败提供政策建议。那么，《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这部“年度社科书”到底讲了什么？包刚升博士曾应邀于2014年12月在中国政法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讲座，演讲历时两小时，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庞金友教授。澎湃思想市场将其讲座录音整理编撰，并请作者修改润色，遂成此文，以飨读者。此为下篇。

从政治逻辑到历史经验

接下来的挑战是，能不能在经验世界中验证这种理论逻辑和因果机制。我的这项研究属于定性研究，用的是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涉及四个国家——德国、尼日利亚、智利与印度——的比较案例分析。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四个案例。这项研究不仅有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而且还有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比如，德国1919年到1933年民主不稳定，为什么德国二战后的民主体制稳定了？再比如，智利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的民主不稳定，为什么80年代晚期转型后的民主稳定了？若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历史分析都能证明我阐述的理论假说与因果机制，那么这项研究应该比较可信。

国别案例的选择有三个原则。一是要展示变量的变化。选民政治分裂程度的高或低，政治制度安排的离心型或向心型，民主政体的崩溃或稳定，要能呈现出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无法论证上面的逻辑。二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德国、印度、尼日利亚是公认的地区性大国，智利国土与人口规模并不大，但通常被认为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三是要展现丰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果我的理论只能解释欧洲，这个理论放到拉美可能完全不成立。而这里的案例选择覆盖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包括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这也有助于强化这项论证。

德国魏玛共和国为何失败？

第一个案例是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民主政体的崩溃，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非常多，我的观点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民主体制导致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崩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裂和“民主 - 威权”维度的政治分裂。特别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这些选民政治分裂又进一步激化了。从政治现象上看，魏玛共和国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暴力事件，选民的投票结构从最初的中间向两端移动，政治议题的冲突性也非常大。总之，魏玛共和国后期选民的政治分裂程度非常高。

从制度上讲，魏玛共和国是典型的离心型政治制度安排。纯粹的比例代表制鼓励了小型政党和新兴政党，削弱了既有大型政党的政治力量，导致了极化多党制。半总统制的安排又孕育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冲突。一个细节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总统任命的总理在国会仅能赢得不到10%的支持率。最终，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1933年魏玛共和国的民主

热新闻
一天 三天 一周
1 最高检通报任润厚案：涉腐被查后死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没收
2 豆瓣、唱吧、爱回收等106款App被工信部下架
3 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4 沈阳一楼盘降价已被要求回收房源，官方：房开违反《价格法》
5 美国会审议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外交部回应
6 顾客买41万手镯遭店员议论气到“眼震”要住院？卡地亚：在处...
7 央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现行7%提高至9%
8 涉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等，上海文峰公司被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
9 四问首个国产新冠特效药
10 易纲：恒大债权人、股东权益将按法定受偿顺序得到尊重
澎湃招聘
澎湃新闻APP下载
iPhone版 iPad版 Android版
联系我们

政体为希特勒极权统治所取代。

那么，二战以后联邦德国(西德)的民主政体为什么能够稳定呢？当时，盟军占领西德实施政治改造，有很多人担心民主能否生根。战后联邦德国民主稳定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方面，二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国家的建设，大大降低了阶级分裂的程度。联邦德国已经使极左政党或极右政党失去了培育的土壤。经济上看，人均GDP的提高速度非常快，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了，福利国家的建设也稳步推进。所以，阶级分裂与冲突的因素就逐步弱化了。

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基本法汲取了魏玛宪法失败的教训，在政治制度上做了重大改进。选举制度上尽管没有废除比例代表制，但由过去的纯粹比例代表制改革为混合型选举制度——一半席位由简单多数决定制选出，另一半席位由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出，但这部分席位又设置了5%的政党选票门槛。实际上，这一选举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淘汰小党，强化主要政党。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形式由过去的半总统制改为议会制，这就消除了行政权与立法权走向政治对抗的制度隐患。由此，联邦德国战后政治制度安排的向心性程度大幅提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魏玛到联邦德国前后的变化，我讲的两个变量都在其中起作用。与魏玛共和国相比，联邦德国战后选民政治分裂的降低和政治制度安排的向心型，塑造了民主政体的稳定。

尼日利亚的族群冲突与民主崩溃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历史上的民主崩溃。总的来说，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1960-1966年）受累于高度的选民族群分裂与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前者使尼日利亚陷于严重的国内政治冲突，三个主要的族群——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控制着三个地区，他们互相憎恨、彼此为敌，政治暴力持续升级。我的研究中有很多当时的资料，包括重要选举的数据，主要政治家的传记、自传或回忆录，重要政治会议的记录，英国外交官的亲身观察与记录，政治暴力与冲突的数据，等等。这些资料都印证了尼日利亚当时存在严重的族群分裂。

此外，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当时，尼日利亚的国土面积根据尼日尔河及其支流的流向，被划分为三个地区，分别是北区、东区和西区，后来又划分出中西区。这样，整个国家被划分为三到四大块，这种安排使得尼日利亚中央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和民族整合。每个地区都觉得自己非常重要，具有抗衡中央政府的能力。这种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使得地区政治的重要性甚至高过了中央政治。一个例子是，北区执政党的领袖并没有到中央政府出任总理，而是甘愿做地区总理，然后派自己的副手到中央政府做总理。可以想见，地区政治与中央政治是何种关系。只有控制地区，才能控制实质性的政治权力。这就使得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尼日利亚中央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和民族整合。最后，联邦政治成为三大地区政党对中央权力肆无忌惮的争夺和恶斗。北区由于人口和席位较多，就控制了中央政府，主要政策对东区和西区均不太有利。后来，来自东区的伊博族军官首先发动军事政变，随后是第二次军事政变以及持续两年多的内战。

内战结束以后，尼日利亚后来的政治史有很多反复，从政变到军人统治，再到启动转型，再政变，再转型，等等。1999年至今，尼日利亚维系了民主制的基本形式，但民主政体本身还充满瑕疵。国际著名评级机构Polity IV连续多年给尼日利亚的评级都是从-10分到10分制中的4分，而国际上一般认为6分达到民主标准。4分尽管不是威权政体，但离“好的民主”尚有距离。但无论怎样，尼日利亚维系了民主制的基本形式，并维持了国家的统一。

那么，如何解释尼日利亚前后的政治变化呢？与第一共和国相比，尼日利亚后来改革了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全国由过去的三到四个大区陆续划分为36个州，中央权力得到了强化。过去，地区总要挑战中央，甚至动不动就要脱离尼日利亚。全国划为36个州以后，每个州都不再有能力挑战中央。如果继续实行几大区的央地模式，尼日利亚可能一直会陷于族群与地区冲突。尼日利亚还在立法上禁止族群和宗教政党，政党不得出现族群、地区和宗教的名称，甚至要求设立政党时必须在全国一定比例的州拥有自己的支部。

尼日利亚在选举制度方面的调整也非常精巧，他们后来要求新设的最高行政长官职位——总统必须要在全国三分之二的州获得不低于25%的选票。这意味着总统的支持不能只来自于人口密集的少数地区，而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赢得较高比例的支持。实际上，尼日利亚是在总统选举制度上提供了一种跨族群的政治激励。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民主政体下具体制度安排的向心型或离心型程度。

但与此同时，尼日利亚仍然存在着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选民依旧沿着族群、宗教和地区的界限呈现高度分歧。所以，今天尼日利亚准民主政体的维系，与该国央地关系制度模式的调整有关；而该国民主程度较低及政治冲突较多，则与依然存在的较高程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有关。

从阿连德总统的社会革命到民主失败

拉丁美洲西海岸的智利则是这项研究的第三个国家。该国在20世纪早期就拥有维系较长时间、相对稳定的竞争型政体——尽管只有少部分符合财产与教育资格条件的社会精英拥有选举权。但这跟英国19世纪的政治模式非常相似。经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政治变革以后，智利的政治稳定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60年代。但再往后来，智利的民主越来越不稳定，1973年9月11日就出现了军事政变，智利的民主政体倾覆了。

这项研究的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智利的政治剧变吗？20世纪中叶之后，智利政治基本上为严重的阶级冲突支配。问题来了：智利的贫富悬殊早就存在，为什么严重的阶级冲突出现在那个时候呢？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财产资格限制的取消和初等教育的普及，下层阶级在50年代以后逐步获得了普选权。这样，有权投票的选民人数很快从数十万增长为三百多万。于是，过去贫富阶级的社会分裂快速地政治化，不同阶级在经济平等和再分配方面的严重分歧逐渐撕裂了这个国家。1970年以后,整个国家的选民日益分裂，要么支持阿连德总统和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反对阿连德总统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智利的比例代表制严重削弱了主要政党的力量,政党体制趋于极化和碎片化。总统制则蕴藏着行政权与立法权政治冲突的危机。尤其是，当总统制与脆弱的政党体制结合时，问题愈发严重。阿连德总统是靠36.2%的选票支持上台的，而他自己的政党在国会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席位，但他认为自己是智利的全民总统。这样，当阿连德总统提出的法案在国会通常无法获得有效票数时，他后来就倾向于依靠总统命令进行统治。当阿连德这样干时，国会认为这个总统已经丧失合法性。这样，1972-1973年的智利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看上去已经岌岌可危，结果是军人政变和民主崩溃。

20世纪80年代末，智利启动了新的民主转型，今天已成为民主巩固的典范。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呢？第一,智利在皮诺切特时代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1995年前后人均GDP已接近10000美元，现在已经接近15000美元。如今的智利已迈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总体上，智利变得更富裕了，普通社会阶层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这样，过去引发政治冲突的选民阶级分裂就大大缓解了。

第二，智利此次转型还改革了政治制度。一是国会议员选举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引入了双名选区制，这种选举制度鼓励了两大政党联盟的形成。二是总统选举从过去的一轮简单多数制变为两轮绝对多数制，这意味着总统当选必须获得50%以上的绝对多数。这样，一方面总统的政治权威得到强化，另一方面促成了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合作。三是设立了总统和议会政治冲突的调停机制，以解决可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宪法僵局。所以，智利今天的政治制度模式尽管很难说符合理想类型的向心型民主政体标准，但向心性程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大幅提高了。

印度“民主奇迹”的政治解读

最后，需要讲讲印度的故事。应该说，印度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案例，印度的民主通常被视为一个奇迹。为什么称为“印度民主的奇迹”呢？因为印度各方面的条件貌似都不利于维系民主政体，特别是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复杂的族群、宗教、语言和种姓结构。解释印度民主的奇迹就是一个难题。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国内政治冲突似乎有所上升，政治稳定性略有下降。国际著名评级机构Freedom House甚至一度调低了印度的自由评级。这也反映出印度国内的政治压力。

当然，关于印度民主的研究成果非常多。用我的理论框架来解释，1947年以来印度民主的奇迹是两个有利因素的结合。第一，选民政治分裂的因素。印度是一个社会结构上呈现高度分裂的国家，国内不同的族群、宗教与语言集团的数量非常多，中间还夹杂着种姓等因素。但是，1947年后的很长时间里，印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程度非常低，选民的政治动员很不充分。一个现象是从4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投票率非常低。印度的这种低投票率不同于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冷漠，而是大量有选举资格公民尚未参与政治的状态。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国大党当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惟一主要政党，所以一开始国大党动员选民的力度不是很大，而其他小型政党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又需要时间。这样，尽管社会结构中的分裂程度很高，但选民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分裂程度，要远远低于社会结构的

分裂程度。或者说，由于现代化程度很低和选民政治动员不足，印度高度分裂的社会结构并未快速地政治化。

第二，印度的政治制度模式是向心型民主政体的典范。尽管《印度宪法》规定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印度在改革之前属于中央集权化的准联邦制，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非常大。（当然，后来改革之后，印度的地方分权得到了强化。）此外，简单多数决定制的选举制度和政府形式上的议会制都是对政治家和政党形成向心激励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塑造强大政党和有效能的行政权，从而能强化国家能力。我书中提供了很多有力的数据。比如，即便在国大党一党主导时代，国大党也无法赢得50%以上的选票，通常只能赢得45%-47%的选票，但国大党控制着70% - 75%的国会议席，就使得它一党主导模式下的国家能力非常强。如果当时印度实行比例代表制，国大党是无法单独组阁的，它必须要跟其他政党联合组阁。比例代表制还有可能鼓励国大党内部更大规模的分裂。原因在于，比例代表制下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即便单独组党，通常也能赢得一定议席。所以，印度民主的奇迹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的结果。

那么，如何解释印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冲突上升的势头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和政治动员程度的提高，这使得更多的人被卷入到政治过程中来，背后高度复杂的社会分裂因素开始政治化。结果就导致印度国内政治冲突的增加，给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但是，印度的向心型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仍在产生积极作用。经过国大党一党主导体制的衰落和20世纪90年代的内阁不稳定，到目前为止，印度的向心型民主政体重新塑造了相对稳定的政党联盟和多数派政府。现在是两大政党联盟主导了印度的政治，一个以印度国大党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一个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印度为什么会兴起两大政党联盟？背后是作为激励结构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安排在起作用，特别是选举制度与议会制度。所以，90年代末至今，印度政府相对比较稳定，执政时间也比较长，国家能力又得到了强化，从而确保了民主政体的相对稳定性。2014年，印度人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人民院多数议席，也跟这套向心型政治制度安排是分不开的。

从民主失败中学习：降低选民政治分裂

借助四国比较历史分析，我系统地论证了理论假说，即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民主体制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崩溃。大家会看到，这项研究是严格按照“提出问题—文献综述—理论假说—经验证据——研究结论”的社会科学规范进行的。所以，这是一项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听到这里，有人可能更关心：我们可以从这些民主崩溃的经验中学习什么？主要的启示是：新兴民主国家应该设法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同时应该尽可能构建向心型民主政体，这会有助于新兴民主政体的维系与巩固。

先谈谈如何降低其选民政治分裂程度的四条政治原则与政策启示。

第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长期当中会降低选民的政治分裂，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则可能提高选民政治分裂的程度。因此，长期来看，发展经济和加速现代化程度是重要的政策；短期来看，则需正视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阶级分裂、族群分裂与宗教分裂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趋势，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启动，这些分裂都可能会被激活，然后升高；但一旦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这些分裂又会趋于下降。塞缪尔·亨廷顿过去说，现代性孕育稳定，但现代化容易导致不稳定。这也适用于选民政治分裂的诸种情形。

第二，降低不平等程度是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重要政策，这包括降低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降低公民个体意义上的不平等，二是降低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获取权力与资源上的“种类不平等”。现在已经有不少定量研究验证了，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过大往往对民主稳定是不利的。其实，即使不做复杂的定量研究，这个逻辑也是清楚的。所以，一个民主社会若能设法消除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对民主的维系较为有利。还有一种情形是，如果少数族群-宗教集团在获取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和社会价值上处于不利地位，一旦他们获得了投票权，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

第三，既要巩固国家统一和强调民族整合，又要尊重不同族群、宗教、语言和地域选民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包容其多样性。这两者都非常重要，怎么同时兼顾两者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当然，不同国家的族群、宗教与语言结构千差万别，历史恩怨和社会传统又差异很大，所以这里提出的只是原则，具体怎么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第四，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快速扩大政治参与和过度强化政治竞争会给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风险，而在政治上平衡好政治精英和大众参与的关系对民主稳定较为有利。这个观点听上去有些“保守”，但这就是我这项研究的结论。

从民主失败中学习：避免离心型民主体制

再谈谈如何避免离心型民主制度安排的五条政治原则与政策启示。

第一，民主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要充分兼顾分权和集权的平衡、参与和效能的平衡。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通常都缺乏维持民主政体自身所需的手段。过去一讲民主，大家注重的主要是分权和参与，但适当集权和政府效能也很重要。如果一个民主政府缺乏适度的权威、没有足够的能力，可能连民主体制本身都维持不了。

第二，成功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并非空中楼阁，而必须考虑并适应本国的社会结构和选民政治分裂的真实情形。宪法和制度必须要在真实的世界里能够运转，所以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匹配性非常重要。假设在一个理想的、没有摩擦力的政治空间里设计宪法与政治制度，成功率通常不会很高。这是新兴民主政体的关键问题。

第三，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要注意适度强化中央集权。当然，这条原则主要适用于存在高度的族群、宗教、语言和地区分裂的国家。对这样的社会来说，要适度强化中央政府维持国家统一的政府能力与权力，要尽量避免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至于那些内部文化一致性很高的社会，比如韩国，央地关系的政治制度模式不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第四，在选举制度上，多数决定制和具有多数决定制特征的混合选举制度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尽量避免纯粹的比例代表制。这里涉及到民主模式的多样性问题，过去国内对此研究比较粗放。大家都知道民主和威权政体的差异，但是民主模式内部怎么样，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民主政体下的不同选举制度选择，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五，在政府形式上，议会制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防止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可能出现严重对抗的情形。总的来看，要谨慎地对待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尽管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也有不少成功的样本。由于美国是20世纪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一讲民主转型，首先就想到美国的总统制模式。但这项研究揭示的是，议会制与总统制相比往往更有利于新兴民主政体的稳定。即便是美国的总统制，也遭到了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在内的很多学者的有力批评。

从民主崩溃展望大国的政治转型

有人可能还关心，关于民主失败的经验研究对一个处在现代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主要启示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高度不平等和贫富悬殊是值得警惕的。一旦允许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高度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特别容易引发高度的阶级分裂，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基于贫富或阶级的剧烈冲突。这种冲突对新兴民主政体的伤害往往非常大。所以，如何降低社会结构中的贫富悬殊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要注意边疆地区的族群问题与宗教问题。转型所带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可能会激发少数族群-宗教群体的政治动员。如果他们的政治诉求是比较温和的，往往不会影响政治稳定。但是，如果政治诉求趋于极化，可能会威胁新兴政体的稳定性。一旦这类问题成为引发暴力冲突的导火索，甚至不得不诉诸武力解决，往往是严重的坏消息。处理这样的问题，非常需要政治智慧。这里的政治智慧，并非权谋，而是应对此类问题的成功的全球经验与合宜的政治原则。

第三，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方面的挑战。令人忧虑的是，不少发展中大国的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对此知之甚少。有人认为，民主就是民主，至于何种民主是一个次要问题，甚至不必深究。在转型关头，一个国家能否设计有效的宪法模式与政治制度，一方面取决于政治势力的角逐，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政治精英们的政治思考。政治精英如何思考政治，往往是形塑未来政治的关键问题。当政治精英们具有更为健全的政治思考能力时，就更可能构建合宜的宪法模式和政治制度，转型成功率就会提高；反之，很容易陷入政治转型的困境。

所以，这就又回到了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1787年提出的一个老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实际上，政治精英们如何思考政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政治转型的前景。

（录音整理：臧继贤、谢秉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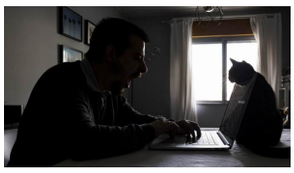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要举报

关键词 >> 民主理论,民主崩溃,包刚升

32　收藏　跟踪: 民主理论

相关推荐



“非工作时间禁止联系雇员”：葡萄牙劳动法带来的启示与问题

2021德国大选｜隧道尽头：新政府的出炉

法国共和党总统初选：即便“茶杯里的风暴”，也并非毫无意义

评论(38)

我要跟帖

已输入0字　发表

热评论

闲来多读书　2015-01-08　6 | 回复 | 举报

在中国学者中，算是比较扎实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了，但其实原创性还是很少的，理论框架是多部名著的综合。如果再苛求一下，将政体的原因归于制度设计和社会结构，固然也没错，但最后导向的或许正是现代的僭政，比如某种类型的所谓社会工程……太科学，而缺少哲学的深度与自省，是本书最大的缺憾

xnnx　2015-01-08　3 | 回复 | 举报

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xnnx　2015-01-08　2 | 回复 | 举报

好长啊！还分上下。。。。。。

新评论

桃花打酒　2015-01-10　0 | 回复 | 举报

继续阅读这一栏目　可否贴出上篇

真善美_2049　2015-01-10　1 | 回复 | 举报

民主•核心价值观•经验～中国加油！

真善美_2049　2015-01-10　1 | 回复 | 举报

民主•核心价值观•经验～中国加油！

二卡蝦　2015-01-08　0 | 回复 | 举报

闲来多读书　1楼　6 | 回复 | 举报

在中国学者中，算是比较扎实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了，但其实原创性还是很少的，理论框架是多部名著的综合。如果再苛求一下，将政体的原因归于制度设计和社会结构，固然也没错，但最后导

原創是急不來的。寬鬆的環境下纔比較容易出原創。發表觀點的同時也要具備謙虛的態度接受批評，真金不怕火煉。不過另一方面，批評和泄私憤也是不同的，：前者爲了揭示真理；後者爲了一己私慾。

xnnx 2015-01-08

0 | 回复 | 举报

澎湃怎么登学术文章啦？就差加注释了

xnnx 2015-01-08

0 | 回复 | 举报

学究气太浓

xnnx 2015-01-08

0 | 回复 | 举报

最后的发展中大国指的是中国吧？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广告及合作 版权声明 隐私政策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 严正声明 行业认证

Copyright © 2014~2021 The Paper All rights reserved.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 沪ICP证：沪B2-20170116 | 沪ICP备14003370号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沪公网安备 31010602000299号